

《资本论》是科学的理论

有人说,《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方法。但是,与牛顿力学和相对论一样,《资本论》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还是科学的理论。曾经有人因为求解不了价值转化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难题,直接宣称《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也就是把《资本论》视为一种方法。但是,恩格斯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大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3页)

由此可见,《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只要科学理论的前提是满足的,它的结论就不会改变,否则真理就不具有绝对性了。众所周知,牛顿力学早就被相对论超越了,但是在今天的大学物理学中,人们还要教和学牛顿力学,甚至在今天的生产和创新发展上,还会大量使用没有与时俱进的牛顿力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而本文之所以要讲《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因为很多学术观点用错误的西方经济学说来指责《资本论》已经过时了,要与时俱进了。但是,一场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把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打回了原型。人们尤其是资本家们在危机时刻不是去捧读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反而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难怪马克思会说:“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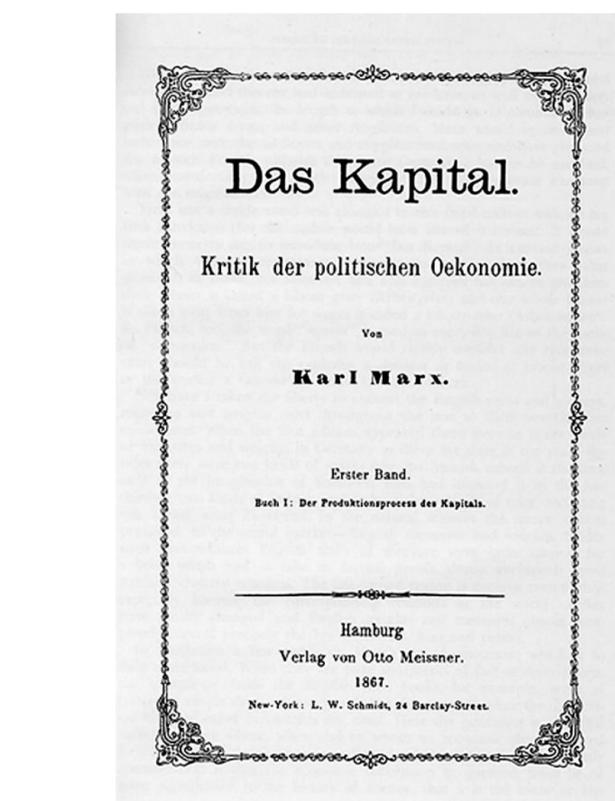
商品与劳动的二重性

《资本论》指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然而,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却认为这种有用性是可以悬在空中的。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不同物品的效用是可以替代的。这意味着效用是可以通约的,从而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也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才能提出效用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但是,谁也不会拿粉笔当饭吃,拿闹钟写字。而且,今天新电脑的效用比20多年前的电脑效用好得多,但其价格却低得多,也说明效用价值论不成立。

商品在交换中能够通约,不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的价值。生产衣服的具体劳动与生产食物的具体劳动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使用价值衣服与食物。但这两类劳动都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这个付出构成抽象劳动,形成了作为商品的衣服与食物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首要贡献是他批判地证明了商品的二重性所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就是要突出住房的使用价值属性,淡化其价值属性,从而表明住房与汽车不同,不能或不宜成为一般性的商品。

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单位时间里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数量,但提高不了其价值量。这是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属于具体劳动范畴,与抽象劳动无关。因此,如果风调雨顺,农民将会发现农作物价格下跌,丰产不丰收。这是因为如果同一劳动量在丰产年表现为8公斤小麦,在歉产年只表现为4公斤小麦,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的价值量就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相同。如果其他商品的生产不受自然条件影响且劳动生产力不发生变化,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在各自当年所能交换回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也相同。

为了对抗劳动价值论,有人提出交换创造价值,但只要他不主张取消加班和缩短工作日,那么就意味着他心非,还得承认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还有人提出机器创造价值,但是复制一百年前的机器用于生产,不仅不能赚钱,还会亏个精光。那么为什么一些无人工厂也能够赚很多的钱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如果无人工厂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大量无人工厂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商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出售就能够获得大量超额



《资本论》德文版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余斌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均衡的经济,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这次美国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出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惩罚的是美国资本家而不是中国人。

利润。另一方面,如果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无人工厂的生产所决定,无人工厂就不能获得超额利润,但生产该商品的部门可以获得本文将在第五部分提到的一般利润率,从而并不少赚钱。最后,如果无人工厂能够垄断其商品的生产,它还能获得垄断利润。所有这些情况,《资本论》都做过了分析,一点也没有过时。

通货膨胀的测量

西方经济学用物价尤其是消费品物价指数来测量通货膨胀,并认为货币发行过多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只要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就能控制物价。

但是,一方面,在货币商品即黄金本身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从而其价格(即该商品与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也应当下降。如果该单个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物价指数所包含的许多商品上时,尽管物价指数不变,但通货膨胀(即纸币的含金量下降)却已然发生了,如果物价“温和”上涨,那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了。实际上,金融寡头常常利用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下跌的时候,滥发纸币,就像今天的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时,由于物价没有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在西方经济学的误导下,人们以为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同时商品卖不出去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也会误以为这是由于纸币的缺乏造成的,从而饮鸩止渴地听任金融寡头滥发纸币。但是,手头持有更多纸币的聪明的资本家们则会去购买黄金来保值。此时,黄金的纸币价格就会上涨。对于这种现象,西方经济学通常把它解释为黄金投机的结果,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纸币贬值的结果。

另一方面,决定商品价值量及其市场价格的机制与决定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控制了纸币发行并不能直接限制商品价格的上涨。金融寡头们在经济危机时期滥发纸币就没有引起价格上涨,相反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主张进行的价格体制改革却直接引发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导致1988年的经济动荡和次年的社会动荡。事实上,《资本论》早就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给商品标价时,只需要有观念上的货币就行了。控制实体上的货币,不能影响观念上的货币按照价值规律给商品标一个“合适”的价格。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是 $w=c+v+m$,其中 w 是商品的价值, c 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价值, v 是为生产该商品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 m 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

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理论,有人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但是,剩余价值的概念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它的本义是超出资本家投资的收益。因此,除非所有的资本家都不赚钱,否则就不能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说明了这个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相互欺骗。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均衡的经济,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这次美国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出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惩罚的是美国资本家而不是中国人。

西方经济学认为,价格的升降可以调节商品

的供求,使之达成均衡。但是,我们看到,大商场每晚关门前并没有刻意降价去促成供求均衡,以便把所有商品都卖出去。《资本论》指出,从生产来看,资本家的供给是他所提供的产品的价值量 w ,而他的需求只有 $c+v$,其中 v 同时代表工人的消费需求。因此,资本家的供给是大于需求的,供求的差额越大,资本家得到的 m 越多,所以资本家必然致力于使供求不平衡。一个资本家如此,所有的资本家都如此,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供大于求的经济。当然,资本家本人的消费需求可以减少一点供求的不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每个小微企业都想发展壮大,也就是说,资本家必然不会把所有的 m 都消费掉,必然有所积累。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生产过剩的。当这种生产过剩扩大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由一场危机来使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贬值,以实现供求的强制平衡。从生产来看, c 和 v 还构成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对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资料采取惩罚性关税必然会提高资本家的成本价格,降低其利润率,使本国资本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美国政府对出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是不可能真正落实和在一定时间内维系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公式还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供给侧调节是不可能救市的。因为这种供给侧调节的核心是对资本家减税,从而只会增加资本家手中的 m ,使生产过剩更加严重,更加难以走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国内有人提出,提高物价减少福利,有利于人民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并举例说欧洲一些国家由于给人民高福利待遇导致国家经济危机和国家危机。但是,人民的低收入和低福利,不仅会增加 m ,加剧生产过剩,而且会使机器生产相对人工生产更贵,从而资本家更愿意使用人力而不利于产业升级。

一般利润率规律

《资本论》最精彩的部分,是其第三卷对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说明。按照马克思之前的劳动价值论, $80c+20v$ 的资本比 $50c+50v$ 的资本使用的活劳动少,其获得的 m 也应当比较少,从而其利润率会比较低。但在现实中,这两个100的资本获得的利润却差不多。劳动价值论面临破产的问题,而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使之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资本论》指出,价值规律本来要求等量劳动相交换,从而商品要按其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但这种交换的前提是,商品是劳动者的产品。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劳动者会愚蠢到用自己十小时的劳动成果换别人一小时的劳动成果。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是归资本家所有的产品,资本家本人不劳动,所以他自己可以拿自己工人十小时的劳动成果换其他人一小时的劳动成果。资本家的要求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满意自己一千万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与别的资本家一百万投资的利润一样多。所有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自由追求的后果就是通过资本在各个生产领域的自由流动,改变供求关系和价格,使所有资本家的利润率相当。如果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为100%, $80c+20v$ 的资本可以获得20 m ,利润率为20%; $50c+50v$ 的资本可以获得50 m ,利润率为50%。在一般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这两个资本要获得同样的平均利润= $(20m+50m)/2=35p$ 。这里利润 p 是剩余价值 m 的转化形式,从而 $50c+50v$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通过价格的升降转移15的剩余价值给 $80c+20v$ 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也是资本密集型的无人工厂虽然工人人数极少但也能获得较高利润的原因。无人工厂的利润不仅来源于本工厂工人的剩余劳动,还来源于社会其他生产部门工人提供的部分剩余劳动,与它自己的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设备和传送设备没有直接关系。

近些年来,一直有人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互补,且不说这会使居于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获得并保持巨额垄断利润,即便是没有垄断的自由竞争,也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本国的剩余价值,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其劳动力众多的优势。显然,中国要加快发展,就不能白白向外输送自己创造的部分价值,就应当摒弃比较优势理论,进入发达国家的核心生产领域并打破其垄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走近世界舞台变成走到并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学术速递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电子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性,不仅给文学作品的词汇、修辞、语篇、语体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语言背后的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导致语言思维的弱化与视听思维的强化。受到影视文化的影响,脚本化的叙事文学创作运用镜头化的语言来突出画面感,但过度强化语言的视听效果,难免牺牲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与丰富性。杂语共生是网络文学语体的突出特征,小白文的流行是近年网络文学语言发展的新趋势,拼装美学与森霖风格必将对文学语言的未来走势产生深远影响。在语言变化异常活跃的电子时代,一方面应该以柔性规范守护语言的交际功能与公共性,另一方面应该以语言创新回应时代的新变。文学语言真正的创新是新旧语言交替过程中的融合与共生,是语言观念的革新,是提升语言境界的系统工程。

——《论文学语言在电子文化语境中的变异》,载《文艺研究》,2018(12)

龚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蔡紫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陈真教授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吗》一文,对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的基本哲学倾向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认为他不加分析批判地认定一切现实存在。然而,这一基本判断不能成立。该文指出,麦金太尔为了寻求对德性本质的界定,从描述性的叙述中归纳出德性本质概念。然而,在其论述过程中,该文试图通过在历史与传统中有效力的德性规范来进行论证。这一论证有事实与价值相混淆的错误,所以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尤其是麦金太尔对掘弃亚里士多德传统德性的现代道德状况的批判表明,将麦金太尔定位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判断上是有失偏颇的。

——《德性与传统——与陈真教授商榷》,载《道德与文明》,2018(6)

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从尼采到马克思:鲁迅的思想转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

张仲谦(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词话丛编》所收录的四种明人词话中,王世贞《艺苑厄言》最能代表明代词学特色及话语方式。《艺苑厄言》大力张扬词的艺术个性,以“婉转绵丽,浅至深俏”为宗风,主张“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作为明代词学的标志性话语,在晚明清初词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晚明时期盛行一时的艳词创作以及“明体词”的形成,均是《艺苑厄言》影响下的产物。晚明清初词选如茅暎《词的》、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贺裳《词谱》以及清初《兰皋明词汇选》《倚声初集》,晚明清初词话如贺裳《词筌》、邹祇谟《词衷》、彭孙通《金粟词话》以及众多词集序跋,均可看出《艺苑厄言》的影响。尤其是清初两大词人领袖朱彝尊和陈维崧,在试图开创清词正朔时不约而同地对王世贞大张挾伐,更可以从反面证明《艺苑厄言》的词学史意义。

——《论〈艺苑厄言〉的词学史意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因为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则并遵守规则,作出判断并作出承诺,展开推理并承担义务。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规范性转向自康德哲学开始,在当代哲学中规范性研究在多个领域蓬勃发展,以规范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

——《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

栏目主持:韩天琪

横跨文、理、工、医学科领域

上海交大探寻汉语特色的言语障碍解决之钥

■本报记者 黄辛

近日,获批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精神障碍人群语料库建设及面向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语言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开题。这一研究项目将横跨文、理、工、医四大学科领域,探索精神障碍人群的语言语言大脑加工机制,为相关临床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桥梁,是心灵的窗户。言语听力能力受损不仅会给患者的日常交流造成阻碍,还易导致社交孤立、焦虑、抑郁等心理认知问题。而且,言语障碍人群不在少数且类型多样,急需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共同努力。然而,我国言语康复事业起步较晚,存在专业服务人员稀缺、评估工具尚不完善、干预手段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健康评估》预

计,未来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然而,与抑郁症这种心境障碍(狂躁症、抑郁和躁郁症等)类似,同样影响我们健康的还有诸如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孤独谱系障碍(自闭症)等许多精神疾患。

近年兴起的言语病理学和人工智能学科,为精神障碍智能诊断和认知神经疗法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为此,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整合院内内语言学与语料库等相关交叉领域的团队,创立了语言、智能与神经科学研究基地,组建言语—语言—听力研究中心,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言语—语言—听力科学发展,向语言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这一战略目标前进。

“在学科交叉中研究‘言语—语言—听力’内

在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开宝表示,研究人员将以语言学为立足点,联合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神经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通过建设精神障碍人群语料库,对患者的言语语言及神经行为数据进行标注和分析,探索精神障碍人群言语产出和感知异常的成因,为相关脑科学机制障碍人群的临床诊疗和干预提供支持与服务。

领衔主持这项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丁卫卫表示,该研究重点将由域外的言语障碍人群拓展到精神分裂症、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精神障碍患者,通过眼动和脑电等最新实验技术手段,通过对比不同人群间语言理解加工机制的异同,揭示汉语母语者语言认知困难的症结所在,推动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汉语特

色的障碍诊断、治疗和康复体系。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李春波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还将利用人工智能对数据进行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多模态联合建模和统计,初步实现智能诊断,有效促进精神障碍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

参与此项研究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言语听力科学系和神经行为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杨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追逐星辰大海,在更多领域走向国内乃至国际前沿。”

“服务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主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丁卫卫对开展这项跨学科科学研究有着自己的展望和见解。她表示,将加强国际化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战略,既重视应用研究,也兼顾基础研究,把探索学术前沿与服务社会作为己任。